

李伯齐 宋尚斋 石玲 / 选注

和传精舍明公开，千年金牛去不回。  
初疑花何破洞壑，谁天树杪出楼台。  
月高清苑西珠落，夜半秋风下界来。  
黄鹤楼登能照俗，将因雨脚自云隈。



济南出版社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  
JINANLIDAIMINGJIASHIWENXUAN



# 李攀龙诗文选

李伯齐 宋尚斋 石玲 / 选注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  
JINNANLIDAIMINGJIASHIWENXUAN



# 李书攀龙诗文选

济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攀龙诗文选/李伯齐,宋尚斋,石玲选注.—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9.4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

ISBN 978-7-80710-767-5

I. 李… II. ①李… ②宋… ③石… III. ①古典诗歌—  
作品集—中国—明代 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明代 IV. I21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7395 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251号(250001)  
网 址 www.jnpub.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45×21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5千  
定 价 38.00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 总 序

李永祥

唐玄宗天宝四年，即公元745年，时年三十岁的杜甫东游齐州（即今济南）。是年春夏之交，他陪同其祖父杜审言的挚友北海太守李邕在济南大明湖历下亭宴请济南士绅。是时，南边的一带青山白云涌起，凉爽的风从湖面碧绿的荷丛中吹来，驱散了亭中的暑热。悠扬的丝竹和歌姬婉转的歌声飘荡在湖面上，良辰、美景，贤主、嘉宾，激发了杜甫的诗兴，他即席赋咏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诗中名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腾誉人口，素为济南人引以为荣，用现今的流行语言说：诗圣杜甫无意间做了济南的形象代言人。

济南是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自上古而至近日，历代名士辈出，灿若繁星，绵延不绝。其中不少名士不仅在他生活的时代业绩卓著，而且沾溉后世、影响深远。济南名士多，确实是济南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最突出的特色。诗圣之语，非虚誉也！历代名士留下了许多著述，这是济南历史文化的瑰宝，是济南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主要载体。整理出版这些文献，是深入研究、弘扬济南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最基本的工作之一，是加强济南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高济南文化品位的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同时它们虽是地方文献，但又是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故而其对中华文化的整体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长期以来,除少数特别杰出的名家乡贤如李清照、辛弃疾等受到重视并得到充分研究外,多数济南名士的著述堆在旧书库里,无人问津,有些甚至鼠咬虫蠹,残损遗失,令人遗憾。故而抢救、整理这些宝贵文献也是迫切的、刻不容缓的。济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早就有志于此,当然在目前市场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做这个工作是面临着不少障碍和困难的。他们基于对家乡文化建设的使命感,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济南名士著述中精选出十家,并诚邀当代济南文史名家,进行编选校注,奉献给济南人民。应该说从事这类研究和出版是付出多而获得少的,是一种难得的奉献精神,是基于对家乡的热爱。丛书的顺利出版也得力于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对济南文化建设的远见卓识以及具体的关心和支持。这项造福当代、沾溉后人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表现出意义的深远和重大,它也是对即将在济南召开的全运会的重要献礼。

济南出版社这批推出的名家选集是确定了很高的标准和严格的体例要求的。首先是作者的遴选,要求作者必须是省、市知名的文史专家且对选题及济南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力求做到是当代名家选注历史名著。而对作品的精选要求充分体现出作者时代和美学特色,注释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要简明通俗,以适合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理解。还要有对作者生平介绍的资料以及对作者成就价值的综合评介,以帮助读者能从宏观上把握作者的特色,为理解作品奠定基础。这是统一的要求,应该说现已推出的每种选本都达到了这一要求。但基于每个选注的

作者具体情况不同，体例上又有所变通，比如李清照的作品古今注本众多，乃至不可枚数。故而，此种选本不以注疏为重，已故的徐北文先生在每篇诗文之后都附写了简明的品评文字。徐先生不仅对济南二安有深入研究，且他精于古诗词写作，所以他的品评不仅多有创见，发人所未发，而且当行不隔，分析鞭辟入里，是其他同类注本不能取代的。另外，有的著述前人从未进行整理，故以校注为重，同时附录作者年谱或年表帮助读者了解作者，这也是前人没做过的工作，这样，选本也就具备了独有的特色和价值。此外，有的作者的作品能编年的按编年排列，如李攀龙；不能编年的按体裁分类编排；有的作者除诗文之外还选了些词曲名篇，如李开先。总之，各种选本体例不尽相同、有所变通，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作者的特色，更好地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作品。所以，应该说体例的变通也是丛书的一个特点。

《济南历代名家诗文选》丛书的出版发行是济南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它将会推动济南历史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为此，我向济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以及丛书的作者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衷心的敬意，我殷切地期待着其他济南名士的著作能尽快陆续出版，形成完整的系列，将这项意义重大的济南历史文化的系统工程做得更快、更好、更完美。此可谓：利在当代，功存千秋。是为序。

2009年2月写于樽居

## 前言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区)人。相传其故居白雪楼在济南东郊王舍人庄东北，华不注、鲍山之间，东距韩仓约十里，今已不存。因家近东海，自号沧溟，人称沧溟先生。李攀龙主盟嘉、隆之际的文坛，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诗名高于当代，影响及于清初百有余年，是有明一代诗文大家之一。

李攀龙生当明代中叶，仕于嘉靖、隆庆两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李攀龙赐同进士出身，试政吏部文选司，第二年以疾告归。嘉靖二十六年，授刑部广东司主事，三年之后升任员外郎，寻迁山西司郎中。嘉靖三十二年(1553)外放顺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有政绩，三年后擢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不满一年即拂衣东归，从此隐居故里，十年不起。隆庆改元，起为浙江按察司副使，二年后迁参政，寻迁河南按察使。隆庆四年(1570)，母丧毁顿，暴疾而卒，终年五十七岁。

李攀龙一生的文学活动，大体与其仕宦生涯相终结。其生平，大体可分为六个阶段。

### 一

李攀龙的先世无所称名，其父李宝“以赀事德庄王为郎，善酒，任侠，不问家人生产”<sup>①</sup>。李攀龙出守顺德，赠为中宪大夫、顺德知

<sup>①</sup> 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载李伯齐校点《李攀龙集·附录》，齐鲁书社1993年版，688页。此下凡引李攀龙诗文，均载《李攀龙集》，不另说明。

府。其父既“以赀事德庄王为郎”，则其家境尚称富裕，而在其父死去后却很快沦落为贫民。据有关记载，攀龙幼时家贫，与其母张氏相依为命。“家徒四壁立”，靠母纺织艰难度日，“率日一饭，即再飧，必鲜饱”<sup>①</sup>。而其母为使儿子成才，决心供其读书，并将家迁于学宫附近，令其就近请教塾师，“伏腊行经师脩，脱珥簪取给焉”。攀龙自奋于学，十八岁入县学为诸生，并取得府学廪生资格。就在这一时期，攀龙与尚在髫年的殷士儋（后为内阁大学士，有文名）、许邦才（后为王府长史，济南诗人）约为知交，三人情趣相投，终生为友。当时府学在今大明湖南面，殷氏居趵突泉西侧，许家在大明湖旁侧水村，大明湖、趵突泉成为李攀龙等常往聚会之处，也为李攀龙常往读书之处。趵突泉为泺水之源，水涌若轮；大明湖汇潴诸泉，为济南景胜集中之地。湖泉之上，林木苍翠，景致优美，并有唐宋以来李白、杜甫、曾巩、苏辙、元好问、赵孟頫、张养浩、边贡等的游踪诗迹。诗人徜徉其中，俯仰湖山，领略泉音柳韵，触摸前代诗人的诗心诗境，切磋诗艺，陶冶自己的情性、品格。

明代自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按指张仪）、秦（按指苏秦）纵横坏其心术”以来<sup>②</sup>，儒家的“四书五经”即成为士子的必修功课，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即成为书塾讲授与科考的主要内容。枯燥无味的经训内容，固定、呆滞的八股文形式，将士子引导进仕禄之途，也将士子的思想死死束缚起来。李攀龙自幼疏狂任放，不乐受人约束，入书塾后，“耻为时师训诂语，人目为狂生”<sup>③</sup>。“唐宋派”的文学家王慎中督学山东，“奇于鳞文，擢诸首，然于鳞益厌时师训诂学，间侧弁而哦，若古文辞者。诸弟子不晓何语，咸相指于鳞：‘狂

① 李攀龙：《为太恭人乞言文》。

② 同注①。

③ 《明史·学校志》。

生！狂生！”于鳞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谁与狂者！”<sup>①</sup>王慎中所“奇”之“文”，当是“时文”即八股文，而攀龙所吟哦的“古文辞”则是与“时文”相对立的古代诗文。自明中期以来，“前七子”李梦阳等为反对宋明理学的思想钳制和“台阁体”，提倡“复古”，标举“古文辞”，而追随者常被人目为“迂”为“狂”。李攀龙所“厌”的是“时师训诂”，即对经文枯燥的训释，虽非八股取士的制度，而其所好之“古文辞”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进步倾向，由此可见他自幼即不甘钳束，表现出疏狂任放的性格。王氏强调这一点，大概也是要说明李攀龙的诗文主张的形成其来有自，非在一朝一夕之间。

## 二

嘉靖十九年（1540），李攀龙二十七岁时中乡试第二名。三年后，即嘉靖二十三年，赐同进士出身，试政吏部文选司，是其入仕之始。第二年，即嘉靖二十四年，“以疾告归”<sup>②</sup>。攀龙是否有疾，以及为什么刚刚入仕旋即“告归”，已难得其详。据其自云“甲辰第进士，恭人随侍太恭人京邸”，“明年疾，予告，随侍太恭人归济南”<sup>③</sup>，则有可能是因其母而归。“归则益发愤励志，陈百家言，附而读之，务勾其微，抉其精，取恒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绩学。盖文自西汉以下，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sup>④</sup>应该说，攀龙此次归里读书，使其文学复古思想进一步酝酿并逐渐形成，进而坚定了他继“前七子”之后提倡复古的文学主张，为其一生的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

嘉靖二十五年（1546），攀龙返京，充顺天乡试同考官，第二年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官职闲散，又成为李攀龙读书及从事文学创

① 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齐鲁书社1993年版，688页。

② 殷士儋：《明故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铭》，同①，685页。

③ 《亡妻徐恭人状》。

④ 同注②。

作的大好时机。王世贞忆述说：“于鳞既以古文辞创起齐鲁间，竟不可一世学。而属居曹无事，悉取诸名家言读之，以为：纪述之文厄于东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拟议成变，日新富有；今夫《尚书》《庄》《左氏》《檀弓》《考工》《司马》，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吾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即是说，攀龙读古书的目的，就是吸取其精华，继承其传统。而当时的读书人为追求功名富贵，大都埋头于阅读“四书五经”和练习八股文，而对古代诗文了解却较少。因此，“谓于鳞师心而务求高，以阴操其胜于人耳目之外而骇之；其骇与尊赏者相半”。但对其诗歌创作，“则心服靡间言”<sup>①</sup>。至于攀龙的诗歌主张及其创作实践，王世贞写道：“盖于鳞以诗歌自西京逮于唐大历，代有降而体不沿，格有变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损，而能纵其夙授，神解于法之表，句得而为篇，篇得而为句，即所称古作者其已至之语，出入于笔端，而不见迹；未发之语，为天地所秘者，则出于胸臆而不为异，亡论建安以后诸公有不偏之调，于鳞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敌也。”<sup>②</sup>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到李攀龙文学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所谓文主秦汉、诗规盛唐，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sup>③</sup>。在创作上，则专事模拟，于古文辞作法，“不必有所增损”，“句得而为篇，篇得而为句”，篇篇模拟，句句模拟，“即所称古作者其已至之语，出入于笔端，而不见迹”，即入妙境。其所作拟古乐府，即为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

今存《沧溟集》中之《古乐府》二百一十余首，非一时一地之作，哪些为在京作品，已难详为考定。诗前有序，说明他所主张的模拟有如汉时胡宽之在长安营新丰，使旧丰县之鸡犬皆识其家。即不

① 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齐鲁书社1993年版，688页。

② 同注①。

③ 《明史·李攀龙传》。

求其神似，而求其貌似。虽也引《易》“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观其《古乐府》诸作，则易汉乐府字句而成篇，如易句而为《垓下歌》、易五字而为《翁离》，据摭《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为《陌上桑》，文词古奥、板滞，内容陈腐支离，令人难以卒读。这部分诗歌是《沧溟集》中的糟粕，历为人所瑕疵，而在当时却为“名家胜流”的王世贞高自称引，“羽翼而鼓吹之”<sup>①</sup>，其声望鹊起，“名乃籍甚公卿间”<sup>②</sup>，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如考察一下李攀龙所处时代的文学状况，就会明白他揭举复古旗帜而赢得士林拥戴的原因。明初以来，以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统治诗坛，其诗大量为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啴缓、虚浮，窒息了诗歌的发展。一般仕禄之徒，仕前汲汲于八股文，仕后为逢迎应酬又纷纷仿效台阁体，其流弊漶漫诗坛百有余年，给正宗诗文的发展带来深重危机。正德、弘治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发动的文学复古运动在嘉靖初年逐渐消歇，此时李攀龙等与之倡和，赢得士林的支持，斯不足怪。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春，王世贞、汪道昆、李先芳、殷士儋等进士及第；世贞试政大理司，士儋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sup>③</sup>。是年，李攀龙与李先芳、谢榛、吴维岳倡诗社。经李先芳介绍，王世贞与李攀龙结识、定交。第二年，李先芳出为新喻知府，而王世贞授刑部主事，与攀龙同曹共事。嘉靖二十八年，攀龙迁刑部员外郎，次年，迁山西司郎中。这时有一位边将犯法，罪不至死，但因未曾贿赂某权贵之子，某权贵即要攀龙判其死罪，而攀龙却根据律条处以

<sup>①</sup>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按察攀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428页。

<sup>②</sup> 殷士儋：《明故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铭》，同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齐鲁书社1993年版，685页。

<sup>③</sup> 事详《明史》本传。

最轻的刑罚。由此可见，李攀龙为官清正，不阿附权贵，这也是他在公卿间名声日隆的原因。在此期间，王、李二人“相切磋为西京、建安、开元语”<sup>①</sup>。世贞自谓自见于鳞，颇悔旧作，“悉烧弃之”<sup>②</sup>。这年谢榛因卢柟冤狱抵京说项，与王世贞、李攀龙结交，经常聚会论诗、唱和。次年，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进士及第。宗臣、梁有誉先入社，与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相继加入，始有“七子”之目。其论诗宗旨，盖与“前七子”相倡和，史称“后七子”。“七子”相聚，“为社会时，有所赋咏，人人意自得，最后于鳞出片语，则人人自失也”<sup>③</sup>。李攀龙诗才超逸，被王世贞等推尊为“七子”领袖。

据钱谦益说：谢榛游京师时，与李攀龙、王世贞“结社燕市，茂秦以布衣执牛耳，诸人作五子诗，咸首茂秦，而于鳞次之。已而于鳞名益盛，茂秦与论文，颇相镌责，于鳞遗书绝交，元美诸人咸右于鳞，交口排茂秦，削其名于七子、五子之列”<sup>④</sup>。王、李等入仕之初，谢榛年长，且是颇有名气的诗人，王、李对其表示尊重，自是情理中事。谢榛从未入仕，始终是布衣诗人，而王、李等仕进并宦游各地，彼此联系减少。同时，王世贞等推崇于鳞，对谢榛有些冷落，这都是事实。但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谢榛在形成“七子”结社后即离开京都，未被公推为“七子”领袖；一是从今存《沧溟集》中谢、李赠答诗的内容看，二人关系并不像钱氏所云那样“绝交”或“削其名于七子、五子之列”。嘉靖四十年（1561），谢榛由邺城返归故里临清，这一年他曾致函李攀龙，并将其新刻的诗集寄赠，李攀龙有《报茂秦书》和《寄谢茂秦二首》可证。从李攀龙的为人来看，他不会因谢

① 王世贞：《吴峻伯先生集序》，载《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一。

② 王世贞：《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书》，载《弇州山人正稿》卷一百二十三。

③ 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齐鲁书社1993年版，688页。

④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谢山人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423页。

榛为布衣就与之疏远。今天看来，或许是因为李、谢二人彼此所处环境不同而接触较少，其诗学思想在发展中也出现了某些分歧，致使二人关系有所疏远吧？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攀龙随侍其母归济南，梁有誉以念母告归，谢榛于七月离京，王世贞也借公差于是年冬返里。从此，七子星散各地，再未能聚会北京，彼此只能借助诗文联系了。

李攀龙供职北京期间，正是权奸严嵩窃弄威柄之时，朝政日非，吏治黑暗。在他入仕前一年，即嘉靖二十二年（1543），权奸严嵩入内阁，从此专擅朝政二十余年。朝廷内外官员的黜陟进退，一决于嵩，因此一般士大夫“辐辏附嵩”<sup>①</sup>，而正直骨鲠之臣因弹劾严嵩，或遭贬外放，或惨遭杀害，以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李攀龙在京八年期间，大学士夏言、大将曾铣、兵部尚书丁汝夔、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等先后被杀，斥逐外放、削籍归里者，更是难以胜计。“七子”中的王世贞、吴国伦、宗臣，或因同情杨继盛，或因事相忤，亦遭贬外放。李攀龙自称“傲吏”，“拓落杜门”，“稍类强直”<sup>②</sup>，不结交权贵，不党附严氏，因名声“籍籍公卿间”，虽未遭害，却淹滞郎署，不得升迁，最终还是外放，且从此未得返京任职。

李攀龙这一时期所作拟古诗多无可取，而于友朋赠答之作中，则时见新意，其中部分近体诗，或写诗文抱负，或抒写乡关之思，或为朋辈酬答唱和，大都对仗工稳、气势奔放，可见其艺术工力。

### 三

嘉靖三十二年（1553），李攀龙外放为顺德知府，出守顺德（今河北邢台）。他刚刚到任，就碰上暴雨造成的水灾：“顷当淫潦为沴，自京畿千里，草骼蔽野，而御人白日，虽有沟壑孑遗，又无以佐

①《明史·严嵩传》。

② 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齐鲁书社1993年版，688页。

公家之急。而山东道塞，使者冠盖相属于敝邑，率不能饬厨传，称其意……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其在某，上之既无庄助、吾丘寿王尝为侍从之望，次之，顺德又不可施以会稽、东郡之政，即某摛藻如春华，何益于殿最哉！诚自知不免于奉职无状矣。”<sup>①</sup>面对顺德的现状，他感到无助，对能否治理好顺德也缺乏信心。然而，李攀龙在顺德三年，竟政绩卓著，赢得上下交口赞誉，是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期。

李攀龙治理顺德，“务为休息”<sup>②</sup>、兴利除弊，做了一些既有利于巩固明王朝统治又给普通百姓带来一定利益的事。

第一，请蠲民税，减轻百姓负担。办了两件事：一是顺德境内旧有种马场，每年按例向国家交纳赋税。而监司（布政使、按察使等）误认为是营马牧地，增赋至二千七百余金，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李攀龙向朝廷如实报告了情况，朝廷批准了他依例减免赋税的请求。二是使府属粮仓留府使用。顺德有永济仓，供府内自给，后令仓粮输送京师，而府内驻军粮饷匮乏，势必再从民间征用，加重百姓负担。顺德遭受洪涝灾害，百姓饥寒交迫，如何筹措？经李攀龙呈请，朝廷仍允许仓粮留府自用。

第二，减轻人民劳役负担。也办了两件事：一是减少顺德民工数额。顺德与真定、大名、广平靠近黄河（故道），工部每年都要从这几个地区抽调民工疏浚、护理河道，李攀龙以顺德“土狡民贫”为由，请求“减其供如真定十之三”<sup>③</sup>。二是请求宽免百姓服任外地的劳役。原来由顺德境内沙河（今邢台南）服役，越广平府永年县（今河北永年东南），抵邯郸（今属河北），始可息肩；反之，亦然。彼此往返跋涉一百七十余里，疲惫不堪。经李攀龙建议，于永年、沙河、

① 《答董学士用均》。

② 殷士儋：《明故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铭》，同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齐鲁书社1993年版，685页。

③ 同注②。

邯郸设驿站，以“宽二邑之力”<sup>①</sup>。

第三，政刑宽简，狱讼大为减少。其他，还曾向朝廷建议：北直隶、河南、山东等诸近河处，可不令其出赋钱，而直接交纳粮米，由水路直运京都，国家与人民两得其便；注意平时粮食储备；设巨鹿官亭、严保甲制度等。

李攀龙在顺德官声大振，其诗文创作也进入旺盛时期。其文多为书牍、奏记，又着意拟古，佶屈聱牙，多无可观。而诗则多为近体，虽内容仍不过赠答唱酬、流连风景之作，却对仗工稳、用典精切，在艺术上取得一定成就。其诗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赠答抒怀、山水纪游、关心时政之作。

在当时出任知府，对一般贪官污吏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肥缺”，即所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大可刮取民脂民膏，以填满私囊。但如李攀龙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并非如此。他以才能自负，常思跻身廊庙，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器重，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一番事业，因将由郎署外放视同贬谪，时有牢骚，常谓自己“落魄”、“蹭蹬”，哀叹不为皇帝所赏识，说“自怜华发冯唐老”<sup>②</sup>，说“风尘落落一狂生”<sup>③</sup>；认为自己四十多岁才做一郡守，“三年不调，意同于弃”<sup>④</sup>，以至“浩然有东意”<sup>⑤</sup>，想要归隐故里了。在京旧游以及王世贞诸诗友而今天悬地隔、星散各地，改变一代文风的诗文抱负也难以施展，尤令其伤心不已，所以这一时期写了不少忆念京华旧游的诗歌。王世贞、谢榛、吴国伦、张佳胤等均曾过访，亦均有诗记其事。顺德境内巍巍太行，滔滔漳水，黄榆、马陵形胜，壮阔苍茫的河朔景象，都曾激起诗人情兴，发而为诗，颇多佳作。如《登黄

① 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齐鲁书社 1993 年版，688 页。

② 《送范大激》。

③ 《郡斋》。

④ 《与宗子相书》。

⑤ 《与吴国卿书》。

榆、马陵诸山是太行绝顶处四首》意境开阔，气势奔放。太行山的崔巍嵯峨及其壮阔苍茫的气势，白云飞瀑、落木悲风的秋日景色，都如描如绘，生动而真切。至于关心时政之诗数量较少，但值得注意。由于嘉靖皇帝昏庸，严嵩弄权，朝政腐败、黑暗，平倭战事屡屡失利。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登陆骚扰江浙一带，至北上山东日照，杀人劫掠，给沿海地区造成巨大破坏。严嵩派其亲信赵文华督浙江、直隶(南直)军兵，约应天巡抚曹邦辅进剿倭寇，军至松江，即被击溃，而赵文华却谎报水陆大捷，奏请班师回朝。李攀龙所辖顺德军即在此次剿倭征行之列，他曾亲自送赴闽兵部官员张佳胤，写有《送张肖甫出计闽广二首》，表达对平倭战事的关心和忧虑。平倭失利的消息传来，诗人的心情可知，《春兴》一诗即为此而写。

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王世贞奉诏省谳畿辅顺德、德平、大名诸地，与攀龙在顺德衡斋相会，并相约到大名与谢榛、卢柟欢聚。不久，他就接到提升为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的诏命。

#### 四

嘉靖三十五年(1556)，李攀龙抵达陕西任所。西安为秦汉故都，人才荟萃。“关中士素习古文词，得于麟为师，又蔚然勃兴矣。”<sup>①</sup>因此，在其赴任之后，自夏至秋，风尘仆仆，“历西、延、平、庆等处，往还四千里，考过府、州、县生童六十余处”<sup>②</sup>，充满热情，想要在任内做出一番成就，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一批人才。今《沧溟集》中有《问西安三学生策》《问华渭诸生策》，即其视学时所拟试题。但是，诗人的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李攀龙到任几个月，他的同乡、山东东阿人殷学督抚陕西。殷

<sup>①</sup> 殷士儋：《明故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铭》，同王世贞：《李于麟先生传》，齐鲁书社1993年版，685页。

<sup>②</sup> 《乞归公移》。

学挟势倨傲，“以檄致于鳞，使属文”。攀龙秉性孤介，对此十分气愤，当即严词拒绝，说：“副使，而属；视学政，非而属也！且文可檄致耶？”同时送去《乞归公移》，文中称因视学辛劳，“忽成泄痢，以至痿疮顿发，肛门突肿，坐卧俱防，下血既多，元气日损”，且“头目眩晕”，无法临卷，请求致仕归里。未待批复，即“拂衣东归”<sup>①</sup>。

关于李攀龙东归，殷士儋说因其“不习西土”，“又念太恭人独家居，遂乞骸骨归”<sup>②</sup>；王世贞说是愤于殷督，“会其地多震动，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东归”<sup>③</sup>。二说大致相同。如读一读攀龙《秋日》《答许右史》《拂衣行答元美》《岁杪放歌》《春日闲居》等东归前后的诗作，即知此次东归非唯愤于殷督，一时冲动，发书呆子脾气，而是感到宦海浮沉的险恶处境眷然思归的。“倦游非一日”<sup>④</sup>、“潦倒竟全身”<sup>⑤</sup>、“慢世吾何敢，风尘且避喧”<sup>⑥</sup>，都是诗人的真心话。就在诗人入陕的前一年，即嘉靖三十四年，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因弹劾严嵩下狱论死，其诗友王世贞冒着忤逆严嵩的风险为杨殓尸，吴国伦则倡议赙送；王世贞由刑部主事贬为青州兵备副使，吴国伦则由兵科给事中贬为江西按察司知事。同时，宗臣也因忤于严嵩出为福建参议。对上述情况，攀龙决不会无动于衷，严嵩倒台，隆庆初年起复任职，即可证明。因此，他的致仕归家，实在是为全身避祸，高自远引，而且若非下大决心，他也不会在官运亨通之际未得复旨而自行东归的。依明朝旧例，在朝大臣年老致仕回籍，称为“予告”，表示优礼；凡“予告”者，均可复起任用。而李攀龙一非朝臣，二非年老，不得“予告”。像他这样离职，按照规定不

① 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齐鲁书社1993年版，688页。

② 殷士儋：《明故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志铭》，同①，685页。

③ 同注①。

④ 《秋日》。

⑤ 《春日闲居》。

⑥ 《夏日东村卧病》。